

密 级：

分类号：

学校代码：10075

学 号：20070568

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民国时期热河匪患及其治理

学位申请人：张桂霞

指导教师：刘敬忠 教授

学位类别：历史学硕士

学科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授予单位：河北大学

答辩日期：二〇一〇年五月

Classified Index:

CODE:10075

U.D.C:

NO:20070568

A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M. History

**Jehol Bandits and Its Gover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ndidate: Zhang gui-xia

Supervisor: Prof. Liu jing-zhong

Academic Degree Applied for: Master of History

Specialty: Chinese Modern History

University: Hebei University

Date of Oral Examination: May, 2010

河北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 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作者签名： 张桂霞 日期： 2010 年 6 月 7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 ，在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

2、不保密 ☒ 。

（ 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 ）

保护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为申请河北大学学位所提交的题目为(民国时期热河匪患及其治理)
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刘敬忠教授)指导并与导师合作下取
得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河北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导
师的研究经费资助下完成的。本人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护知
识产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河北大学的相关规定。

本人声明如下:本论文的成果归河北大学所有,未经征得指导教师和河北大
学的书面同意和授权,本人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和传播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内
容。如果违反本声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声明人: 张桂霞 日期: 2010 年 6 月 7 日

作者签名: 张桂霞 日期: 2010 年 6 月 7 日

导师签名: 刘敬忠 日期: 2010 年 6 月 7 日

摘 要

民国时期，热河匪患十分严重。民国初期，热河土匪开始大量产生，土匪活动处于勃兴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热河土匪活动进入到了最猖獗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膨胀，热河的土匪产生了分化，土匪活动转入低潮。抗战胜利后，热河土匪活动再次猖獗。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热河土匪在种类划分、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活动方式上有其独有的特点。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滋生土匪的土壤。民国时期，热河地区特有的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环境是土匪涌现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社会造成了众多危害。为了治理匪患，民国热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最终，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

本文在论述热河土匪概况和分析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利用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分别论述了热河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这两种政治势力对热河土匪的治理情况。热河土匪的进一步研究对热河社会，甚至整个民国社会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关键词 民国时期 热河 匪患 治理

Abstrac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the Jehol bandits move very rampant, and its develop has a cour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itial period, the Jehol bandits start to produce massively, and the bandit moves is at the vigorous growth stage. At the 20th century the 20s, the Jehol bandits moved enter the most rampant time. After “9·18” emergency, along with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influence's inflation, Jehol's bandits moves is at low ebb.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wins, the Jehol bandits move once more rampant. As a social class, the Jehol bandits in the type divisi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the active way have its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The old China's reactionary control is the multiplying bandit's soil.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the Jehol area unique geography, the economy, politics, the militar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re the reasons which the bandit emerg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s bandit is a serious social question and has caused much harm to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govern the banditry, the Republic of China Jehol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aken the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separately. Final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liminated Jehol's bandit thoroughly, has consolidated the newborn democratic political power.

This paper discusses Jehol bandit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their cause. Based on the use of many of original file data, it discusses two kinds of political forces that ar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Jehol bandits and their impact. Jehol bandit's further research has a benefit to the Jehol society, even to the entire Republic of China society studies.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Jehol Bandits Governing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民国热河匪患	4
1.1 民国热河土匪情况概述	4
1.1.1 民国热河土匪的演变历程	4
1.1.2 民国热河土匪的种类划分	9
1.1.3 民国热河匪患的区域特色	10
1.2 民国热河匪患成因	13
1.2.1 地理因素	13
1.2.2 经济因素	14
1.2.3 政治军事因素	17
1.2.4 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	21
第 2 章 热河地方政府对热河匪患的治理	25
2.1 民国热河土匪的危害	25
2.2 民国热河政府的治匪策略与措施	27
2.2.1 出台法律规章镇匪	27
2.2.2 增强组织力量抗匪	28
2.2.3 剿抚并用治匪	32
第 3 章 中国共产党对热河匪患的治理及肃清	34
3.1 中国共产党对土匪政策的转变历程	34
3.2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剿匪	36
3.2.1 抗战胜利后热河土匪的罪恶活动	36
3.2.2 共产党的剿匪政策	37
3.2.3 剿匪过程	39
结 语	42
参考文献	43
致 谢	47

前言

一、研究意义和学术史综述

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热河的匪患贯穿于整个热河近现代社会，它的兴亡与热河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密切相关。对民国时期热河匪患进行研究，对于研究热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近代中国的土匪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初。基于侵略的需要，一些日本人对东北的土匪作了初步的调查。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人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对当时的会党和土匪作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但多是感性方面的，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进入民国后，土匪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何西亚的《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一书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从土匪的定义、起源、种类、组织规律、生活状况、枪械来源、隐语及全国分布情况等方面对民国初期的土匪进行了阐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共产党成立后也开始关注土匪，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土匪尤其重视。毛泽东对土匪的性质、兴起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待土匪的策略等进行了理论论述，为中国革命对其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国内关于土匪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数蔡少卿的《民国时期的土匪》和邵雍的《中国近代绿林史》。同时，彭先国的《民国时期的湖南土匪史探》是区域土匪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另外，冉光海的《中国土匪》、鹤年的《旧中国土匪揭秘》、黄建远、孙先伟、刘培昌著的《土匪的历史》、曹保明的《东北土匪》等都是关于近代中国土匪的有影响力的著作。

近年来，国外也出现数本关于民国时期的土匪的代表性著作。其中英国学者菲尔·比林斯利（Phil Bilingsley）（贝思飞）所著的《民国时期的土匪》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较高评价。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Hobsbawn.E）所著的《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把着眼点放在了“侠盗行径”的分析上。

关于热河地区的土匪，迄今少有研究。现有涉及到热河地区的土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燕赵扫残——华北大剿匪》、《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剿匪斗争——华北地区》、《关东马贼》等。关于热河土匪的专题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现。热河土匪的资料主要散见

于各种近代报刊、地方志之中，至今没有成册资料汇编，资料搜集难度也较大。《申报》、《大公报》、《晨报》等影印报刊中有关于热河土匪的零散纪录。由于热河行政区划已经撤销，因此关于热河地区的文史资料多分散于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资料中。其中较为集中的介绍热河土匪的有《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承德文史资料》（第2、3辑）、《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以及《近现代朝阳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赤峰市郊区文史资料》、《丰宁文史资料》、《开鲁县文史资料》、《林西文史选》、《凌源县志》、《隆化文史资料》、《滦平文史资料》、《围场文史资料》等等。另外，由热河革命史编委会编的《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和《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涉及到热河研究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关热河地区土匪的论文就聊聊几篇。《1922年至1932年河北省匪患及其成因研究》（张增萍，河北师范硕士论文，2002年5月）对热河的一部分区域内的匪患做了简要研究。程子华等人的《冀察热辽剿匪概述》（军事历史，1991年第6期）和他们的《乐为人民安天下——冀察热辽剿匪斗争纪实》（党史纵横，1991年第2期），概括性的介绍了抗战胜利之后的冀察热辽地区的剿匪斗争。李妍的《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世纪桥，1998年第3期）和赵俊清的《略论东北解放战争剿匪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党史纵横，1988年第11期），在论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剿匪时也涉及到热河地区，但都未深入研究。可见，关于热河土匪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本文主要依据了承德市档案馆和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并参照了热河地区的历史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力图全面论述热河的匪患，以期有益于民国土匪问题的研究。

二、相关界定

（一）研究区域的界定

热河的建制始于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当时设置热河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置承德府。1914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热河特别行政区域，脱离直隶省而直属于民国政府，辖卓索图、昭乌达两蒙、17旗、15县。1928年9月，国民政府将热河改为省，属于关外东北四省之一，辖15县和20旗，省会设在承德县（今承德市），总面积19.2万平方公里，人口349万，奉系军阀汤玉麟担任热河省主席。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划入伪满洲国，并把河北省管辖的长城以外的青龙、宽城、兴隆地区和察哈尔省的独石口地区划入伪满州的热河省，把原归热河省管辖的朝阳地区

和赤峰北部地区划了出去，使热河只剩 7 县 6 旗，面积也缩小为 8 万余平方公里。1945 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解放了热河，将其恢复为以前的建制。1947 年 5 月，国民政府重新划定热河省区域，辖 20 县 20 旗。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保留热河省，重新划分为 2 市、16 县、4 旗。1955 年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热河省。次年正式撤销热河省，将热河省辖的承德、朝阳、赤峰地区分别划入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热河的区划在 200 多年间虽几经变更，但地理位置变化不大。它西以阴山山系的支脉与察哈尔省为界；东以辽宁省的柳条边墙；北与辽宁省哲里木盟、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相连，南沿长城线与河北省为临^①。

由于热河省的建制已经撤销，固本文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准。

（二）研究时段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时段限于民国时期，其中 1933 年到 1945 年这段时间，热河省被划入了伪满洲国，由于资料的限制，不作细致的研究。同时，基于研究的连贯性，对民国前后的土匪情况也略有涉及。

^① 河北省档案馆：186—1—18—3。

第1章 民国热河匪患

1.1 民国热河土匪情况概述

1.1.1 民国热河土匪的演变历程

热河地处关外，历代统治者鞭长莫及，政权相对薄弱。热河的土匪兴起于清末，盛行于民国。清朝末年，外敌入侵，政局动荡，地方政府腐败无能，官吏残酷盘剥百姓，土匪由是滋生。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局更加动荡，热河变为“匪徒的丛林”，竟至出现“兵匪一家、官匪一家、甚至绅匪一家”^①的现象，匪患尤为严重。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热河土匪的演变过程，笔者将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热河土匪的勃兴时期（民国建立到20年代初）。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倒行逆施，对内进行残酷的压榨和盘剥，对外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外国势力乘虚而入，日俄不断在中国北部地区侵扰。日本甚至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直、皖、奉军阀三雄鼎立、轮流执政，其他地方军阀偏安一隅、力求自保的局面”^②。

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热河地处战略要冲，联系关内外，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战争灾害尤为厉害。热河人民受到军阀和蒙古王公贵族的共同压榨，生活十分悲惨。社会、阶级、民族矛盾激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农民不断的掀起反抗斗争。热河地区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抗洋教等各种形式的正义斗争来反抗封建剥削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时，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逃荒的流民、被遣散的士兵和一些地痞流氓或成立匪帮或投入已有的匪帮，壮大了热河土匪的“队伍”，加重了热河的匪患。

热河土匪活动在这一时期处于勃兴阶段。“热河各属土匪猖獗，比年来，蔓延益甚，扰乱乡里，蹂躏人民，淫掠焚杀，凶残毕至，渍突骚扰，鸡犬不宁”^③，“热境各旗，汉、

^①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7页。

^②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92页。

^③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398页。

蒙马贼勾结为患，所在皆是，防不胜防”^①。1913年，3月22日，“赤峰州知事申报巴林匪扰年歉情形云：昭乌达盟旗及巴林洵旗等均受匪扰”^②。

当时，除了热河境内有频繁的土匪活动外，北部边界的蒙匪活动也十分猖獗。其中，危害最大的当属巴布扎布匪帮。“蒙匪”巴布扎布，先后投靠沙俄和日本，危害热河北部地区10余年。1911年，沙俄策动当时尚在中国管辖下的外蒙古独立，由大活佛哲布尊巴宣布“独立”。这个傀儡政权网罗大批胡匪、马贼，组成叛匪队伍，在沙俄、日本的指使下，大规模的侵入内蒙古地区，进行骚扰。巴布扎布率领的“蒙匪”是这伙叛匪的主要力量。在“蒙匪”的侵扰下，热河北部的林西、开鲁、经棚等地受害最深。1912年，巴匪攻占了热河北部的经棚等地，经棚、林东等地的农牧民遭受巴匪抢劫蹂躏，十室九空，十分凄惨。1916年，巴匪再次侵扰热北地区。在战斗中，巴布扎布被炮弹炸死，但林西1000余间房屋被烧毁，300多名无辜民众惨遭杀害。巴布扎布死后，其余党仍到处侵扰。1916年，巴匪余党第三次攻打林西县城。1922年，巴匪余党在开鲁惨杀民众300余人。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巴匪被日本人缴械遣散，这支匪队才最终消失。

第二阶段：热河土匪的最猖獗时期（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

20世纪20年代是热河土匪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匪患最为严重。这一时期，军阀混战更加剧烈。在北方，先是直奉军阀联合打败了皖系军阀，接着直奉军阀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然后是北洋军阀的势力在国民军的北伐声中衰落了下去，热河进入到了汤玉麟统治时期。两次直奉战争，都给热河以严重的战争创伤。尤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热河作为主战场之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的军饷筹措使热河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战争之后兵员得不到适当的安置，军队匪化。汤玉麟横征暴敛，政治更加昏暗，地主、官吏、土匪相勾结，盘剥百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致于沦陷前在当时群众中流传着“宁作亡国奴，不作汤家狗”^③的说法。很多生活不下去的百姓沦为盗匪，加上热河一带原本就匪盗横行，使热河地区的匪患发展进入到了最严重的时期。

这一时期，有具体记载的土匪活动就有十多起，总结如下：

^①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388页。

^②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③ 河北省档案馆：186—1—78—4。

匪祸时间	为祸区域	土匪帮派及祸行	出处
1920 年 5 月	赤峰县、围场县	张洪亮、孙宽、袁尚文等赤峰、围场等地抢劫，匪首刘大肚子聚集 20 多参与抢劫。	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 5 月第 1 版，第 331 页。
1920 年 5 月	凌源县	匪首盖七省凌源县 20 多人到处抢劫。	同上
1921 年 3 月	赤峰县	匪首李凤等 16 人在赤峰绑架煤窑股东李文荐及其护勇，抢去抢马，勒索五万大洋；掳去开鲁县人刘长荐，索洋一万元。	同上
1923 年 1 月 23 日	丰宁县	丰宁县大阁镇被匪抢掠。被击毙商民二十名，重伤二十四名，绑去男女人票十名，焚烧房屋一百一十八间。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7 页。
1923 年	开鲁县城	胡匪许喀叭等内外勾结，攻破开鲁县城，大肆抢劫，商民遭殃。	同上
1924 年 12 月 12 日	围场县	白三阎王（白凤翔）白匪假冒奉军旗号率股匪四百余名入县至公署，开枪劫狱，各公所及各商号均同时遭抢并绑走县长黄士祥及商民 17 人，损失巨大。	围场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围场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1989 年 7 月，第 107 页。
1924 年 5 月 21 日	建平县 赤峰县交界	驻日赤峰领事馆通译生北村太郎及平冢笃等在建赤交界遭胡匪抢劫，引起外交事件。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8 页。
1925 年 8 月 15 日	隆化县	“荣三点”（克什克腾旗蒙人，汉名宝振荣）抢劫隆化县二区，打死男女各一人，绑架人票六名，并抢去钱财、枪支等。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1 页。
1925 年 12 月 2 日，	滦平县	滦平县政府呈报：奉军溃兵在兴洲、小城子一带抢民家衣物、钱财，烧毁民房，打伤村民多人，群众苦不堪言。	同上
1927 年	丰宁县	土匪“白三阎王”、祥子、老四木匠、黄司令等各率匪徒数百名，集聚大滩一带，任意掳掠，十室九空。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6 页。

另外，没有确切记载的匪祸也很多，在民国时期的《申报》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不胜枚举。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热河不断受到各种土匪的侵扰，“林西经棚什巴尔台，均有匪踪，昭乌达蒙全部摇动”^①。1921年7月，热河“边氛日急，土匪复炽……蒙匪进逼……西乌旗迷僧庙等处党匪已向西北逃窜，匪首奈登扎布，退居游各吉庙”^②。1922年12月，“朝阳铁路被截，格毙李刘两匪，获沈崔两匪”^③。1923年4月，“库匪又犯林西、经棚等处，形势吃紧”^④。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是热河土匪活动最为猖獗、匪患最为严重的时期。

第三阶段：热河土匪分化、衰落期（30年代初到抗战末期）。

这一时期，热河的土匪活动产生了分化，土匪活动处于衰落时期。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即出兵侵占东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唤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觉醒。热河省的土匪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土匪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抵抗日本侵略，一部分投靠了日本侵略势力，充当日军侵华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继续抢劫勒索，由此，传统意义上的土匪活动大量减少。

在热河，土匪抗日武装成为了东北抗日武装的一部分。首先举起抗日大旗的土匪当属高鹏振。“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在辽西召集40余股的土匪首领聚会，号召抗日。土匪头目一致同意抗日，并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推举高鹏振为司令，当时约有3000人报名参加，编了4个团进行抗日。1932年，高鹏振等抗日武装与吉林抗日救国军联合，转战辽北、蒙边和热河东部。热河地区抗日的匪首还有朝阳的刘振东，活动在凌源、建昌一带的邓云峰以及刘明和、唐占奎、李士君、大同字、串地龙、平东洋、史义等，他们为东北的抗日战争起了积极作用。1933年，热河被划入了日伪统治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通过它在各地方建立的治安维持会，对抗日义勇军实行政治欺骗，同时动用日伪军对义勇军进行剿灭。随着日伪法西斯集权统治的加强，热河抗日的土匪一部分战死疆场，一部分溃散、逃亡，一部分投降日伪军，一部分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① 《申报》1921年6月27。

^② 《申报》1921年7月13日。

^③ 《申报》1922年12月10日。

^④ 《申报》1923年4月7日。

继续抗日。热河土匪活动逐渐衰落了下去，人数由 1931 年的 1.4 万人^①减少到 1940 年的 140 人^②。

第四阶段：热河土匪再次猖獗并最终覆灭时期（抗战胜利到建国初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土匪活动再次猖獗。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必须控制热河、察哈尔及东北。正如刘少奇所说：“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③。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占东北，抢夺胜利果实，率兵进占热河，同时网罗日伪残余势力、土匪武装，收编加委，配合其军队向解放军和民主政权猖狂进攻。

这一时期，土匪遍布整个热河地区，数量多、成分十分复杂、分布范围很广、危害极大。土匪的来源主要有：1. 国民党笼络的汉奸、特务、伪军警，讨伐队和惯匪。被国民党笼络的这些力量多被委以“先遣队”、“别动队”、“绥靖队”、“自卫军”、“保安队”等称号；2. 叛匪。这一时期的叛匪主要来源于一些搞假投降汉奸、伪警察和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人、革命干部。这些叛匪主要出现在国民党向热河大举进攻时期。国民党第一次向热河进攻（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2 月）时，在热东、热中、热辽等地区，地区部队、县支队、区小队出现了一批叛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热东叛变 1070 人，热中叛变 1160 人，热辽叛变 850 人^④。1946 年 8 月至 10 月，“国民党向热西、热北进犯，侵占承德，赤峰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热西叛变 50 多起，达 2978 人”^⑤。由于这部分人对于我党、我军比较了解，所以危害极大。3. 惯匪。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全省先后有 428 股，匪徒 45674 名”^⑥。

这一阶段，热河的土匪势力随着国民党的进攻而猖獗，随着国民党力量的消涨而消涨。在国民党力量衰退的时候，热河地区的土匪势力也消退了下去，并最终在共产党的清剿下覆灭了。

^① 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 4 月第 1 版，第 9 页。

^② 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 4 月第 1 版，第 246 页。

^③ 侯一民：《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71 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 6-7 辑》，1990 年 5 月，第 4 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 6-7 辑》，1990 年 5 月，第 4 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 6-7 辑》，1990 年 5 月，第 2 页。

1.1.2 民国热河土匪的种类划分

热河的土匪按其性质或身份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积匪、义匪、兵匪、会匪、教匪、梟匪和烟匪等等。热河地区的土匪主要有积匪、义匪、兵匪、烟匪四种。

积匪，亦称世匪、惯匪，学者蔡少卿将他们定义为“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索活动的惯匪”。他们穷凶极恶，所到之处，不分贫富良莠，一律洗劫一空，使穷苦人民陷入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这种土匪往往受家庭或周围环境的影响，而长期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索等活动，甚至世代为匪。民国时期，热河地区存在大量以打家劫舍、抢劫财物为生的土匪，虽经过历次捕杀，仍大量长期存在，直到新中国解放前后才彻底灭绝。

义匪，即蔡少卿所说的“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和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土匪”。霍解释他们为“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是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活动在热辽边境的高鹏振就是这种类型的土匪。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只抢大户，不扰百姓。他为匪的10余年，据说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是典型的义匪。

兵匪，蔡少卿将其解释为，“大多是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逃跑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①。英国学者贝思飞将其解释为一个辩证的过程，“即军队的‘土匪化’和土匪的‘军队化’”^②，扩大了兵匪的涵盖范围。无论是哪种解释，兵匪在热河都是一种重要类型。官兵与土匪本为孪生兄弟，他们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③。民国时期，热河地区战事不断，很多土匪被收编成为了官兵，战争稍息，一些散兵游勇、遣散的部队又成了土匪，之后土匪又因战事成为了官兵。这样循环往复，匪、兵就合为一体，他们表面上是军队，实际上是土匪，亦兵亦匪。

烟匪，蔡少卿解释其为“专门从事鸦片毒品走私贩运的匪帮”^④。热河地区适合鸦片种植，民国时期受到政府支持后，更是大面积种植，日伪时期，敌伪分配地区、强迫种植，种植面积约占全热河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鸦片的大量种植，使热河出现了贩运鸦片的匪帮。他们大多是季节性的，大烟收获的季节是烟匪活动的频繁时期。清末民初，

^① 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1912-1927）》，河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② 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69页。

^③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土匪实录 中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④ 河北省档案馆：186-1-78-4。

热河地区走私鸦片，谋取巨额暴利的土匪很多，鸦片多运往天津和辽、吉、黑三省，次之为北平，山东。赤峰的张桐轩是当地有名的鸦片贩子，“每年‘烟季’收下，或自营或与人合伙，雇上骡驼上，有时用汽车，武装弹压，运到北平出手”^①。

1.1.3 民国热河匪患的区域特色

1.1.3.1 民国热河土匪的地理分布

土匪活动遍布热河各县，东部的朝阳、凌源、北票、阜新，北部的林西、经棚、开鲁，中部的赤峰、建平、平泉，西部的承德、滦平、围场等地都是匪患严重的地区。总的来说，热河的匪患主要集中在边境和半农半牧区域。

边境地区是土匪活动的理想场所，通常“那些地方的政府管辖能力要比中心地区弱的多”^②。“在那些三个或者更多的省或县交汇的地方……政府官员常常觉得，当那些惹是生非者离开了明确由他们管辖的地区时，他们的责任也就结束了……当土匪受到威胁时，只要溜过那些交界地区便可以躲避追捕和惩罚”^③。热河和直隶、奉天（辽宁）交界地带是传统的匪区，土匪常在这一带往来窜扰。“满洲的土匪活动频繁侵入邻省，如热河”^④。王怀庆主热期间，“驻热河的毅军，与奉军感情颇恶”^⑤。当时“热河归直隶管辖，锦义一带归奉天，直奉两军经常发生争斗”^⑥，土匪亦往来窜扰，人民受害颇深。另外，围场、多伦和经棚三角地带，由于行政上是热河和察哈尔的交界，地形上是一片四、五百里的沙漠，沙漠中不仅有许多小片绿洲和农民安置的临时住所，而且还有丛生的灌木，便于隐蔽。蒙汉匪首宝振荣和白凤翔就利用这个区域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了窜扰热河西部和察哈尔东部的股匪。

半农半牧区域。热河的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出现的农牧混合的区域也是匪患严重的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赤峰市郊区文史资料》，1991年1月，第118页。

^② [英] 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3页。

^③ [英] 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3页。

^④ [英] 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36页。

^⑤ 《申报》1922年2月4日。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2辑》，1986年8月，第129页。

地带，这个区域主要分布在“老哈河和西喇木伦河两岸的刚设置不久的十几个县境内”^①。热河最早完全是牧区。清朝年间，很多汉民迁入热河开垦荒地，在热河南部慢慢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区；而北部的蒙古王公封建区域，到了民国年间还有很多地方未曾开垦，一直是牧业区。于是，热河就有了农业区、牧业区，并且在两区之间出现了一个蒙汉杂居和旗县并存的半农半牧区，也是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带。这一带“环境复杂，统治松懈，超经济掠夺成为风气，豪强很容易暴富，外地的流浪人极多，缺少封建的政教文化束缚”^②，具备了土匪滋生的因素，土匪于是大量产生，土匪活动甚为频繁，匪患甚为严重。

1.1.3.2 民国热河土匪的组织规模

热河土匪按组织规模的大小可分为小股土匪和大股土匪。小股土匪是拥有数人、几十人、最多不超过一百人的匪帮。这种土匪常以结拜形式结合，组织结构相对简单，除了一、两个匪首外，其余匪徒没有分工，为一般土匪。这种土匪的活动范围比较小，活动一般是季节性的。由于热河军事地位极高，历来统治阶级在热河各处，布置着一个镇压人民武装起义和防堵追剿土匪的军事网，因此热河的土匪很难发展壮大，一直以小股土匪为主。

据1921年1月的统计，热河境内有土匪几十支，都属于小股土匪。赤峰、经棚、围场地区的有小八点40余人、张洪亮20余人、尤彦九30余人、大小火堂楼字30余人、大小翻字点30余人、生铁字20余人、于铁匠20余人、抄亭字10余人，建平、平泉、朝阳、阜新、绥远、开鲁地区的董光火30余人、王石拉字29人、盖七省20余人、赵玉山20余人、刘万里10余人、季六20余人、徐占山10余人、月泰山20余人、白金山10余人、王大个子20余人^③。

日伪占领以前热河的小股土匪主要有四木匠、黄司令、罗老耗子、王文法、王秃子等，大约百余股。

大股土匪就是拥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匪帮。这种土匪通常是由几个小股土匪联合起来组成的。组织比较复杂，除了有一个有威望的大头领之外，还有二头领。二头领的数目一般由构成大股匪的小股匪数目决定。这样的匪帮离心力比较强，活动范围比较广，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1996年7月第1版，第17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1996年7月第1版，第17页。

^③ 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331页。

活动不再局限于本区、本县，而是常常扩展到别的县甚至别的省。

日伪侵占热河前，热河的大股土匪主要有荣三点（宝振荣）、白三阎王（白凤翔）、龙三点（真名不详）、巴布扎布、信字杆（李守信）、许喇叭等十多股^①。抗战胜利后，大股匪很多，比如夏国祥、王铁山、于秀成、滦相臣、张其昌、陶汉选、赵珍、伊相臣、腾永昌等匪帮。

1.1.3.3 民国热河土匪的活动方式及特点

土匪靠暴力抢劫、绑架勒索、强硬的摊派勒捐、贩卖鸦片等手段聚敛财物。由于“干骨头上榨不出油水”，所以热河的土匪一般不抢劫贫下中农和穷苦牧民。贫下中农与穷苦牧民对于地主和牧主的被抢劫存在庆幸心理，希望土匪替他们出气，于是对土匪尽力帮忙。因此，热河的土匪多能潜伏活动。通常，“当家的”（土匪头子）把部下“漫开”（四处分散）以后，一方面躲避追捕和通缉，一方面寻找新的目标，确定后再出去活动。匪徒们除了有各自投奔的“窑儿”（宅院），“分项”（分赃）以后仍然回有钱有势的“大家儿”（立起堂名字号及有钱有势的大家）护院或是回军队继续当兵。“‘当家的’离开旧‘摊子’后，出去和‘大家儿’或军队结账，顺便也就‘爬了风’（潜伏躲避）。虽然众人不知他的去处，他却知道众人隐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有‘线头’（情报人员）经常和他接触来往。他根据‘线头’的汇报，决定再‘出摊子’或是继续‘漫’下去。……把旧‘摊子’拾掇起另组新的‘摊子’要隔一段时间才行”^②。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土匪会再次“出摊子”。

土匪“出摊子”主要有“卡线”和“砸窑”两种营生，即“拦路抢劫”和“攻打抢劫大户人家”。“卡线”多在白天动手，对象不外乎镖车、烟土驼子和“肥秧儿”（肉票）。先由“引线的”（暗探）打探好信息，包括镖车、烟土驼子等的出门日期和必经路线，然后土匪们在险要地方埋伏起来，临时隔断交通，等待抢劫对象出现。镖车、烟土驼子、“肥秧儿”等一般都有“炮手”保护，所以，一场“卡线”战斗就不可避免。热河土匪的“砸窑”对象按其富裕程度和防守能力，分为“软窑”、“硬窑”、“响窑”三类。土匪除了绑架土财主，一般不愿意“砸窑”。因为若遇到防卫能力强的“响窑”，都有“炮手”站在碉堡上抵抗，一两个小时攻打不下来，而且有可能引来民团和他们进行战斗。

热河土匪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兵匪结合，危害性强。兵匪结合是

^①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土匪实录 中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1996年7月第1版，第29页。

热河土匪活动的显著特点。热河民间流传：“抢的猛的当统领，抢的欢的当营长”^①，很多狡诈的无业流民都把当胡匪作为出路。土匪遇到官兵围剿，没有退路时就投降军队。招降后，在营中时日长了匪性复发，借口外出，进行抢劫。这样，“不少胡匪，时而是抢人的‘响马’（亦称土匪），时而是护院的‘炮手’，时而又成了站岗的官兵”^②。其二、匪股常联合。热河的土匪以“杆子”为组织单位。“杆子”强弱大小不同，多则上百人，少则三、四十人组成。“合杆”，就是把几伙土匪和到一块，集中强有力的人马。热河土匪常以“合杆”来壮大自己，进行稍大规模的活动。比如遇到“卡大线”、“卡大窑”以及和官兵对抗的时候。这是，一股土匪的力量往往太单薄，需要“合杆”进行活动。但是，因为“胡匪在自己的‘杆子’里，是相互猜忌的；合起‘杆子’更是各怀鬼胎，所以‘合杆’的组织非常脆弱，临时凑合，一遇劲敌，即各不相顾，很难连续聚拢到一起”^③。其三、流动性强。除了围场、多伦和经棚三角地带，热河的土匪因为受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很难建立根据地。因此热河的胡匪大多只有潜伏区而无根据地，流动性很强。他们常常是三、四十人组成的小股，“到了‘合杆’的时候，才可以三百两百的聚起，出完‘摊子’即行化整为零‘漫开’”^④。匪首李守信 22 岁时（1914 年）从北票出来，到朝阳、阜新、北镇、开鲁一带为匪。后来成为土匪首领后，常在建平、赤峰、阜新、北镇一带骚扰，没有固定的据点。由于热河地区的土匪流动性极强，常穿梭于县与县、省与省交界地带，交替为害，因此防剿十分困难。

1.2 民国热河匪患成因

民国时期，热河地区的匪患是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深化的一个表征。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土匪滋生的温床。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残酷压榨广大穷苦百姓致使民不聊生是热河地区匪患严重的直接原因。同时，热河地区特有的地理条件为土匪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可能。

1.2.1 地理因素

热河匪患产生的地理因素主要体现在热河特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灾害频繁上。

1.2.1.1 天然的地形、地貌特点

^① 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 5 月第 1 版，第 333 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 7 辑》，199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8 页。

^③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 7 辑》，1996 年 7 月第 1 版，第 24 页。

^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 7 辑》，199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7 页。

热河的地形地貌为土匪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热河地势易守难攻，自古有“天险”之称。境内大山连亘，巍峨耸立，海拔多在千米以上。山脉统属兴安岭与阴山山脉两大系，其支脉纵横省内各地。境内以辽河、滦河为主，形成纵横的河流体系，水势湍急。在荒河断谷间常常形成小块的平原、盆地和村落，这些地方又是天然的“隐蔽所”。比如热河的朝阳，境内都是些大山深沟，牐牛河昼夜吼叫，有所谓的“山高水暴出刁民”、“险固足以自守”，一直是滋生土匪的窝穴。

1.2.1.2 自然灾害频繁

民国时期，热河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繁。建平、凌源、朝阳三县交界地带，“一九一一年涝雨成灾，收入无几；一九一二年发生粘虫，没有收成；一九一三年蝗虫成灾，庄稼被吃光；一九一四年又闹狗蝇虫吸谷浆，谷子无收。连续四年灾害，民众吃穿无着，常有人饿死路旁，就连凌源县知事伍钧也不得不承认：‘民间十室九空，户鲜盖藏，若不加以体恤，绝非地方之福’”^①。1924年，热河“夏春抗旱，播种延期，夏秋之交，淫雨为灾，平野半成泽国，高原多患淹没，秋收无望，四野嗷嗷”^②。“自民国十六年起，又连续水、旱、虫、冰等重灾，而十八年尤甚。如隆化、凌源、林西、平泉、赤峰、围场等县，向称产米之乡（在热河各县比较上说），皆‘颗粒未收’……树皮、草根等物被民众剥食净尽”^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走投无路时加入匪帮成了一种选择。

1.2.2 经济因素

热河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蒙区，以农牧业为主。由于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热河一直是一个丰足之地。清朝末年，伴随着中国殖民化的进程，热河的经济逐渐开始恶化。进入民国以后，“蒙荒放垦”和“鸦片开禁”两项政策，带来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多的是造成了热河经济的严重破坏。同时，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使破产的小农雪上加霜。

1.2.2.1 得不偿失的农业政策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和热河地方当局实行“蒙荒放垦”、“鸦片开禁”两项农业政策，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第41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318页。

^③ 《大公报》：1931年5月30日。

热河农牧经济步入破产的境地。

1. “蒙荒放垦”

热河地区以农牧业为主，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情况直接关系到广大热河百姓的生存。热河由于地广人稀，农牧业经济曾经有过很长时期的繁荣。但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一方面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方面为了防御日、俄的侵扰，加强对蒙地的军政统治，开始将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作价出售，开垦耕种，即所谓的“蒙荒放垦”。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清廷准热河都统廷杰所奏，开放敖汉旗蒙荒2万顷，继之又在巴林放垦蒙荒8000顷”，之后，“鲁北、天山、经棚相继开垦……至1911年，共放垦巴林右旗土地8000余顷，放垦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左、右两旗土地计约8000顷”^①。“蒙荒放垦”之后，热河地区的农业和农业区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生态平衡和蒙古族牧民的传统畜牧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制定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和《边荒条例》，大规模放垦蒙旗土地，造成了广大蒙古族牧民失掉了牧场而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而汉族农民因为需要付出荒价银而遭到剥削。各系阀、官僚和商人都把放垦蒙地视作发财的途径，大肆强行放垦。1921年，热河都统汲金纯决定在阿鲁科尔沁旗放垦一万零八百顷荒地。到民国15年，据统计，“已经放垦15万多顷”^②。“蒙荒放垦”使草地沙化，给热河的农牧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2. “鸦片开禁”

民国初年，日本人在热河境内以观光游历为名，进行贩毒活动，使得热河境内种植和吸食鸦片兴起。民国6年，国民政府严令查禁鸦片种植，但热河的鸦片种植在偏远山区没有中断过。民国8年，热河都统姜桂题实行“鸦片开禁”政策，允许百姓种植鸦片，并设烟政科来征收烟地捐税，名曰“禁烟罚金”，一亩地省征5元，县附加1元，一共6元，从此鸦片种植一发不可收拾。到了贪腐的“汤氏小朝廷”时期，政府设置奖励，鼓励甚至强迫鸦片种植。到1928年，“热河种植鸦片已达一百万亩”^③。1930年，热河的“凌源、赤峰、朝阳、围场、丰宁等县都在七百顷以上，而平泉县竟有八百余顷，总计

^①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5页。

^②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3页。

^③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8页。

烟苗不下一万余顷”^①。与此同时，热河人民的负担却越发沉重。烟地捐税从开始的“特税金扩展到印花税、出境税，税率由每亩 5 元增加到 10 元，另加征军事特别税”^②。“热河更奇怪的现象，不仅是迫民种烟，而且迫民吸烟，禁烟局历年按四季向各乡按户发烟灯执照，每盏灯每月纳大洋二元，定名曰‘灯捐’，民众吸烟之家亦非领不可”^③。“天津大公报揭露‘用挖肉补疮办法打开严禁，全省膏腴之地，化为烟花罌粟之物，计有百万余亩，每年征收税款千万余元’，‘省库日穷，人民日苦，污吏却肥’”^④。鸦片的大量种植，粮谷种植减少，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人民苦不堪言。

“蒙荒放垦”和“鸦片开禁”这两项农业政策引起了土地兼并与掠夺日益严重，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据有关资料统计，热河地区约占总人口 10% 的地主，拥有土地总数的 60-70%，最高达 80%；而占人口总数 60—70% 的贫雇农，仅占土地 15-20%^⑤。占人口大部分的贫苦农民受地主的封建盘剥，农民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蒙荒放垦”和“鸦片开禁”两项农业政策，极大的改变和破坏了热河的农牧经济结构，引起了农牧业经济的破产。“商业日渐倒闭，农村恍若病窟。疾近膏肓，大有不可救药之状！而捐粮号草（驻军征粮草）一夕数至，鞭捶棒撻，视以为常。中产之家破其炕壁，坏其门窗，室内污秽遍布，以防军人之旅寓。农夫则断肘厥踵，妇褥则绽裤露衣，沉靡之气，污秽之状，向所未睹”^⑥，该描写再现了当时热河农业破产后的惨状。

1.2.2.2 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

民国时期，热河当地的官员、军阀设立各种捐税盘剥百姓。1922 年时，政府的捐税不下 20 种，有“地亩税、附加地亩税、商税、房捐、游兴捐、桥捐、路捐等”^⑦，多如牛毛。热河都统汲金纯统治时期，下令到处设卡，强迫交盐税，实行由当地乡绅包办，巧立名目，肆意加码盘剥百姓。到奉系军阀汤玉麟统治热河时，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光土地税金每亩地就有 28 种之多，折合大洋 1 元至数元，另外还要交纳军粮 7.5 斤，军草

^① 《大公报》：1931 年 5 月 8 日。

^② 凌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凌源县志》，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 页。

^③ 《大公报》：1931 年 5 月 8 日。

^④ 中共朝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近代朝阳人民革命大事记 1836-1949》，沈阳：白山出版社，1989 年 6 月第 1 版，第 36 页。

^⑤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48 页。

^⑥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3 页。

^⑦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4 页。

19.5 斤。鸦片税由初期的每亩 3 元大洋增至 12 元，最多的 19 元，并且，还一再预征。如由 1931 年竟有预征到 1961 年至 1971 年的。更加之滥发纸币，兴业银行券在 1925 年 1 元兑换 1 元大洋，到 1933 年 50 元兑换 1 元大洋，甚至 72 元兑换 1 元大洋，如同废纸一样”^①。捐税花样也不断翻新。“关于‘禁烟’方面有‘禁烟罚金’、‘特别印花捐’、‘处境捐’和‘灯捐’等……有‘眼捐’（即有眼的器物捐，如井、碾子、磨捐等）和‘喂养牲畜捐’等”^②。在这样的形势下，热河经济几乎崩溃，更加民不聊生。

热河的“王公贵族等世袭土地所有者多以雇工、租佃等方式剥削榨取劳动人民血汗。汉族地主除采用雇工剥削外，还采取‘无力青’、‘有力青’等剥削方式，其中以‘有力青’最为残酷，剥削量占一个劳动力的全年所得的 70% 以上。绝大多数是‘一年血汗一身债’。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一年青，踏进坑，儿子孙子还不清。爷榜青，爹榜青，我榜青，娶不上媳妇断了根’”^③。另外，高利贷以及不等价的商业剥削加剧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于是王公贵族、恶霸地主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却挣扎在死亡线上。

1.2.3 政治军事因素

民国时期匪患猖獗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政局的动荡、吏治的腐败、军阀的混战等政治军事因素都刺激着土匪的滋生和蔓延。

1.2.3.1 政局动荡，社会紊乱

1912 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也埋下了军阀混战的种子。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帝国主义乘机染指，军阀连年混战，政局动荡，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政权力量的衰弱为匪徒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越是政权不稳定甚至政权崩溃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出现大规模的匪徒活动”^④。民国的政权衰弱为匪徒的大量产生提供了条件。

日俄不断侵扰，试图进一步扩张，蒙古王公贵族趁机兴风作浪；热河的地方政府不断进行着权力的交替，地方军和各系军阀的热河争夺赛也伴随着各自势力的消涨而展

^①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1 页。

^② 《大公报》：1931 年 5 月 31 日。

^③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49 页。

^④ [英] E.J. 霍布斯鲍姆（Hobsbawm.E）著，李立玮，谷晓静译：《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9 页。

开，这些共同造成了热河政局的动荡。

沙俄对于中国北部边疆早就怀有侵略的野心。17 世纪初，它就开始侵略我国蒙古地区，鸦片战争之后，他更是运用军事侵略和外交讹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入侵。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政权的交替，沙俄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地区历史上一直就是中国的领土。1911 年，沙俄“导演了蓄谋已久的外蒙古‘独立’丑剧，接着又策划了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①，沙俄还不断指使外蒙古叛军向内蒙古地区窜扰，使出“蒙古人打蒙古人的毒计”，使民族同胞自相残杀。1912 年 10 月，随着沙俄进犯我国内蒙古地区，热河少数蒙古王公贵族公开叛乱，鼓吹内蒙独立。先是扎鲁特右旗牧主土木尔乌力吉、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扎普和奈曼旗四等台吉图鲁扎布等人发动叛乱，于 10 月 20 日攻陷开鲁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县街商铺尽成焦土，乡村房屋只腾残灭，所有汲水井尸骸填满。大凡居住之地，鸡犬无存……种种残毒，实不忍闻”^②。接着土默特旗贵族巴布扎布率军 2000 余人侵扰热河，攻占经棚，兵临林西城下。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侵入东北以后，企图“进一步染指以热河为中心的东蒙地区……(于是)派遣大量浪人，潜入热北地区，与蒙奸、土匪结合，资以枪弹，发动叛乱，妄图扶植傀儡政权，变东蒙为日本殖民地”^③。日俄的侵扰、蒙古王公的乘机叛乱，加剧了中国的政治危机，中国的政局更加动荡。

政府频繁更迭。从 1912 年到 1928 年的短短 16 年时间，热河的都统就更换了 8 位。尤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伴随着直奉的扩张，热河的都统更是走马灯一样的变换，这一时期也是热河匪患最为严重的时期。直皖战争之后，奉系张作霖的势力膨胀起来。1921 年，北京政府决定“牺牲姜桂题，付以检阅使的虚名”^④，把热河交给了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奉系军阀第一次统治热河。随着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失利，汲都统的热河地位也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暂时胜利的一方的直军总指挥王怀庆。一年之后，王都统又被吴佩孚委任的米振标取代了。米振标都统也只在任一年多就伴随

^①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19 页。

^②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2 页，转引自《盛京时报》，1913 年 2 月 19 日。

^③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9 页。

^④ 《申报》1921 年 9 月 13 日。

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的失败而结束了。之后的阚朝玺奉系都统因在郭松龄倒戈中反应迟缓被免。最受人民爱戴的宋哲元都统，上任仅四个多月就因冯张交恶，冯失利而退出了热河。最后一位是东北军第十二军军长汤玉麟，他是统治热河时间最长的，也是为害最多的都统。随着权力的交接，政府人员更动更是十分的频繁。1921年10月，刚刚上任热河都统的奉系军阀汲金纯就借口“热区多匪”，任命了剿匪总司令和剿副，之后把持热河的烟酒署，并将事务局分局一律裁撤归并财政厅。阚朝玺接任热河都统后，“各军政机关人员，均已逃避，仅存者亦多不接洽，故自阚接事后，更换极多”^①。政权的频繁更迭的背后是权利的争夺，同时伴随着武力的较量。

外敌入侵，政权的频繁更替等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失控、社会的紊乱，匪患在这样的政局下愈发炽热。

1.2.3.2 吏治腐败，官匪一家

热河历届都统和各级官员大都腐败无能，任人唯亲、中饱私囊。热河都统汤玉麟统治热河后，在二十个县旗和三个旅军队中广置亲信，很是腐败。“阜新县的铁杆知事李宗元被大虎长婿周铁铮所接替；阜新县税务局局长换了大虎的次婿苟荫南；汤大虎派他最懂事的儿子汤左荣做了热河省禁烟局长；汤大虎当扛活时的雇主高复礼的儿子高玉堂成了他军政兼管的某机要处首脑；清河门外张子良，由于其父张厥老爷与汤帅的往日瓜葛，成了热河省民政厅长；稍户营子北沟广发堂王柏山是汤帅多年的侍卫——副长官”^②等。汤都统本身是土匪出身，和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剿匪一直不感兴趣。他任命的各级官员上任后只知道榨取民脂民膏，不管百姓的疾苦。

热河的军队一面防匪剿匪，一面通匪窝匪，为土匪提供武器。王怀庆任热河都统期间，热辽边境匪患十分严重。驻扎双方边境的直奉两军不但不剿匪，还利用土匪打击对方。奉军二十八师的杨旅长与匪首郑万林相勾结，并委托郑万林纠集大帮土匪，深入朝阳地区进行扰乱。“民国13年巨匪白三阎王，以前由票匪投诚毅军充当统部副官。及直奉战争，毅军退却，白匪由前线潜逃，纠集亡命多人在赤围边沿一带扰乱。彼时军事方殷，军队无暇顾及，又因军官来围招白匪投诚者数起，均不准警、甲剿击，遂将匪势养

^① 《申报》1925年1月8日。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阜新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阜新文史资料 第5辑》，1984年6月，第40-41页。

成，盘踞于赤峰之盔甲山一带”^①。

官吏和军队的腐败，造成了无论是谁当了热河的都统、主席，都无法彻底剿灭热河的土匪。

1.2.3.3 军阀混战，兵匪一家

热河地处长城外，东临辽宁，南接河北，西连察哈尔，北靠内蒙，是东北和内蒙诸省区与关内联系的联结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直皖战争之后，直奉军阀在扩张势力范围的同时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直奉都视热河为扩张门户，双方争夺激烈。从库伦叛乱到两次直奉战争，热河都卷进了战争的漩涡，热河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战乱迫使一些农民和无数的士兵走上为匪的道路。

1. 战乱殃民

战争首先是物质的消耗。为了战争的胜利，双方都为筹饷不遗余力。1922年11月，热河都统王怀庆在热河强行发行军饷公债30万大洋，人民苦不堪言。1930年，4月“热河省民政厅发出各县应缴驻军粮秣数目提议书：平泉县粮草折合大洋三十一万三千零八十五元五角；赤峰县粮草折合大洋二十五万零四百六十八元；围场县与赤峰县同；承德县粮草折合大洋二十万零八千七百三十三元；凌源县粮草折合大洋十二万五千二百三十四元二角；绥东、除化县与凌源县同；滦平县粮草折合大洋八万三千四百八十九元四角，阜新、林西、经棚、朝阳、丰宁与滦平县同。总计大洋二百零六万六千三百六十一元五角”^②。巨额军饷都落在了老百姓头上，负担过重，兵灾为甚。1930年6月5日，丰宁县长窦茂芳呈报热河省政府：“自直奉战争以来，屡有大军云集，军队众多，匪盗愈重，军至匪窜，军返匪来，往返串扰。迄无宁岁，故三四两区已无人烟矣。一年军费不下二百万元，商民困苦，食树皮菜根以充饥者比比皆是”^③。战争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迫使很多走投无路的农民当上了土匪。

2. 兵流为匪

民国时期，热河的军队匪化问题十分严重，其原因主要有三个：①招匪为兵。招匪为兵，使得匪患更加猖獗，一方面由于很多官兵匪性未灭，造成热河官兵的素质非常低，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围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围场文史资料 第3辑》，1989年7月，第107页。

^②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2页。

^③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3页。

当兵时间久了，匪性复发，又开始到处骚扰、抢劫；另一方面，军阀在招匪扩充了兵力的同时，更加剧了争斗。^②欠饷问题严重。北洋军阀时期，热河地区战事频繁，士兵因为各系军阀和地方军队不断扩充，军费开支巨大，军官又常克扣，致使缺欠军饷现象十分严重。1921年7月，热河都统姜桂题电云：“滂江吃紧，热镜震动……饷械两缺，商民惶恐，秩序动摇，又因各军欠饷过巨，军心难定……速将欠饷暂拨半数，以维军心”^①。9月，姜又索饷：“所有毅军欠饷二百八十余万”^②。1923年4月，朝阳镇守使殷贵致王怀庆密电：“惟取所带直军巡防四营，欠饷九月，兼辖炮兵连，欠饷十九月，艰难困苦，借贷无门”^③。可见当时军队欠饷问题十分严重。士兵由于缺饷，逃跑为匪的越来越多。^④散兵为匪。20世纪20年代，直奉军阀争夺地盘，热河的驻军不断变动，大小兵变时有发生。1922年7月10日，王怀庆电云：“热河承德半壁山游击队兵变，抢劫商户”^④，当时“热河兵变，实有四营之多”^⑤。1925年，“热区胡匪，向未彻底剿除，加以直方溃军，又多窜入热河境内，新匪旧匪，互相勾结，势极披猖”^⑥。哗变、溃退或遭裁撤的军队很多沦为土匪。兵流为匪造成热河地区的土匪危害更大，匪患更加严重。

1.2.4 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

1.2.4.1 强悍的民性

热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清代以前的热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蒙古等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和睦相处。清朝末年，大量汉人迁入，开垦荒地，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热河由于多民族长期相处，各民族相互影响，形成了朴直强悍的民性和“极具反抗精神”的区域精神。“重气节，为践信义，虽死不辞……颇富冒险精神”^⑦。

近代热河人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纷纷揭竿而起，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马傻子起义、金丹教起义、铍子沟人么抗洋拒官斗争、凌源县张明久领导的

^① 《申报》1921年7月30日。

^② 《申报》1921年9月16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37页。

^④ 《申报》1922年7月10日。

^⑤ 《申报》1922年7月16日。

^⑥ 《申报》1925年1月8日。

^⑦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9页。

抗捐抗税斗争等,沉重的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强悍的民性。强悍的民性为热河地区衣食无着或走投无路的民众走上为匪的道路提供了内在条件。他们或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帜,或本着发财的梦想,或单是为了替被土匪杀害的亲人报仇,大批的投奔山林,沦为土匪。尤其在灾荒、农闲或高粱成熟的时节,他们三五成群,活动在群山峻岭或高粱地里,亦民亦匪,亦兵亦匪。

1.2.4.2 民间陋习的存在

民国时期,热河地区鸦片泛滥,吸毒、赌博风气很盛,这些染有赌博、烟毒嗜好的群众是热河土匪的重要来源。不少劳动人民因为赌博加上烟毒而被迫走上为匪的道路。

热河地区种植鸦片,人民亦吸食鸦片。以赤峰县为例,民国时期,“赤峰县吸食鸦片的到处都有,男女老少不等,而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当时赤峰县吸食鸦片的,少说也有上万人(民国三十年有人估计,全热河约有烟民三十万),……中等人家有一人吸食鸦片很快就会由小康到贫穷,以至家破人亡”^①。为了筹烟钱,家里卖光就到外面偷窃抢劫、坑蒙拐骗、杀人害命。

民国时期,热河赌博现象也很严重,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都会赌博。每年的秋后,地主刚给雇工发了工资,这时是赌风最重的时候。尤其是半农半牧地区,土地开垦不久,地广人稀,很多外籍雇农都拿赌博来消磨时间或碰运气,往往输光了钱而走上杀人抢劫的为匪道路。

热河“大家儿”的护卫武装、驻军和县区的巡警,以及蒙旗王府衙门的小队,很多既赌博又抽鸦片,手中常常缺钱,如果没有其他生财之道,便无法挥霍浪费,于是当土匪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1.2.4.3 传承的历史

热河匪患严重离不开它传承的历史。张作霖、汤玉麟等都是土匪起家。热河人民受张、汤影响较深,认为当土匪可以“成就地位”。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一些人试图效仿张、汤,搞土匪武装,来发展自己的势力,造就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利欲。于是,热河一些百姓不以为匪为耻,每遇兵荒马乱,不少人或者投靠匪帮,或者窝藏包庇土匪,或者接济土匪武装。

1.2.4.4 落后的教育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赤峰郊区 第二辑》,1991年1月第1版,第41页。

热河地处边荒，交通滞塞，文化落伍，“内部既无言论机关（如报馆、杂志社等）向各方表现其内中情形，外围的新文化更很少机会输入”^①。热河农民，大部分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被长期禁锢。热河地区的教育落后，“人民读书者少，向不问法律，于是有强权无公理之可美，印入本地人民脑中，力大变为王或士兵，被革者，被假者……流为本地人，与本地青皮浪子联络，勒索、敲诈，目地势四通发达”^②。落后的文化教育、禁锢的思想为一些热河群众走上为匪的道路提供了更多可能。

1.2.4.5 蒙汉民族矛盾

热河原属蒙区。起初，汉人多以“商业高利贷、欺骗等办法向蒙人占地。军阀时代，以诱骗或威胁等办法掠夺蒙人的土地”^③。蒙汉民族矛盾加深，冲突时有发生，尤其在半农半牧区域表现得最为突出。“热属全境，办系蒙汉杂居，虽云习惯久经……每因一事之齟齬，遂成莫解之仇恨，甚至彼此寻衅，互相陷害，互相谋害，结怨遗及子孙，永无完了之日。加之政界之中，蒙官总疑汉官袒护，汉官又谓蒙官受愚，两相猜疑，亦成嫌隙，致种族之意见愈深，故感情之联络匪易”^④。另外，恶霸地主常常利用热河地区的民族矛盾，他们想方设法把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心理转移到汉族与蒙古族的种族冲突上去，故意因起民族纠纷，加重民族矛盾。

1.2.4.6 与外国势力相勾结

热河地区有的土匪还和日俄势力相勾结，常常受到日俄势力的庇护和教唆。例如，臭名昭著的匪徒巴布扎布曾多次受到日俄的教唆和支持。1915年8月，沙俄人乌萨缔赏给巴布扎布24支手枪，并许诺给他购买快枪一万支和大批弹药。在沙俄的支持下，巴布扎布搜罗了1000多叛匪，编成15个营。1915年9月，在沙俄的指使下，巴匪得到三万卢布充作军费。同年11月，在中国的围剿下逃窜到哈拉哈河一带的巴布扎布直接受到沙俄的庇护。

除了沙俄，日本也勾结土匪势力。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亡清宗社党，搜罗土匪武装，组织“勤王军”，阴谋武装复辟。日本还勾结巴匪进行侵略，日本浪人送给巴布扎布大量的火炮、机关枪、步枪等武器，教唆巴匪侵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使巴匪

^① 《大公报》1931年5月8日。

^② 《申报》1917年5月1日。

^③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48页。

^④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400页。

力量壮大，加剧了匪患。

1.2.4.7 与“大家儿”巨室相勾结

热河的土匪都和“大家儿”相勾结。其主要原因是，热河的“大家儿”不敢得罪土匪，土匪亦靠“大家儿”来庇护。热河的地主、富农，汉族商号、镖局、寺院，蒙古的王公、牧主、喇嘛等，因为需要和外界进行各种经济活动而难免会遇到土匪抢劫，如果不和土匪交朋友，就很难通行无阻。而如果结交了势力大的土匪，小股土匪就不敢侵扰，这是“大家儿”依赖土匪的一面；另一方面，热河的胡匪在活动前需要向“大家儿”借枪借马、购买子弹，分散开后更需要“大家儿”替他们窝藏人质和销赃。于是，形成了土匪与“大家儿”巨室相互依靠，相互勾结的局面，从而导致热河的土匪愈发猖獗，匪势愈加炽烈。

第2章 热河地方政府对热河匪患的治理

民国时期，热河的土匪通过暴力抢劫、绑架勒索、强硬的摊派勒捐、贩卖鸦片等手段聚敛财物，带给社会、人民无穷的灾难。民国时期，热河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控制、武器监管和剿匪力量的加强等方面对土匪进行治理，但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土匪存在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再加上官匪勾结，使得民国时期的匪患一直比较严重。

2.1 民国热河土匪的危害

民国时期，热河土匪的大量活动，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对当时热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造成了社会混乱、政局动荡，民不聊生。

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是民国时期土匪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过来，土匪的大量产生及其疯狂活动又直接影响着政局的稳定。热河土匪的存在使热河原本动荡不安的政局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其中巴布扎布匪帮屡次侵扰热河北部的林西、开鲁、经棚等县，他们攻城掠地、烧杀抢劫，危害颇多，造成政局更加动荡，百姓受害颇深。

20世纪20年代，蒙匪的侵扰对热河的政局影响最大。1921年1月，“蒙匪已节节进逼，延至热河边境，赤峰口已有大批匪军出没，不过尚未敢与官军公然冲突”^①。为了铲除匪患，张作霖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受命征匪的同时，也使奉系的势力扩大到热察绥区，加剧了直奉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之后，汲金纯率领奉系势力进驻热河，和热河的原驻军时常发生冲突。“1923年，库匪又犯林西经棚等处，形势吃紧”^②。在匪患严重的情况下，“奉则以旅行演习为名，直则以防匪为名，各有装备”^③，直奉势力在热河形成对峙局面。热河地方军队和各系军阀收编土匪扩充势力相互对抗，“卢占魁部在热境招匪，皆有新械，其势不弱，保拟将靳云鹏胡景翼两师，挑一部赴热剿匪”^④。蒙匪的入侵，刺激了军阀势力的膨胀，加剧了军阀的斗争，导致了政局动荡的加剧。

“兵匪不分，官匪不分”是热河土匪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热河的土匪的危

^① 《申报》1921年6月9日。

^② 《申报》1923年4月7日。

^③ 《申报》1923年4月24日。

^④ 《申报》1923年5月4日。

害性更大。热河突出的兵匪现象加剧了热河百姓的苦难，致使民不聊生。军队和士兵是用来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民国时期的军队虽然更多时候是军阀们权利争夺的工具，然而军队的匪化，使得军队和士兵的职能荡然无存。1922年8月，奉系溃军在凌源县境内大肆焚烧抢掠，“男无论老少横加凌辱……女无论大小强迫奸淫……继之以火焚烧，烟焰涨天，哭声遍野”^①。此外，官匪不分使得热河的政治更加黑暗。李守信是热河有名的官匪，以“合杆”合得多、各方面的眼线拉得长和“打窑”打的响著称。他27岁入伍热河游击马队，当了近四年的兵匪。31岁升官以后仍不断和土匪勾结，和官僚、地主、商人、土匪头子交朋友，可以说是官匪结合的典型。1933年，李守信利用日本侵占热河林西之时，招兵买马，组织伪“蒙古军”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之后又为国民党成立“东北人民自卫军”，收编众多土匪从事祸国殃民的行径。

第二，热河的土匪对经济的暴力掠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土匪不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的寄生群体，其抢劫、强硬摊派等活动对社会经济和人民财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1913年3月22日，热河都统熊希龄在《警戒热河官吏通报》中指出：“热河所辖赤峰、开鲁、林西、阜新各州县，自去岁奈扎鲁特蒙汉匪徒棍布扎布图们乌勒吉等，勾结库匪，聚众为乱，蹂躏城乡，开鲁县治，鞠为丘墟，人民财产，概被抢毁，蒙古王公宅亦多付之一炬。死者骨积尸横，正待掩埋，生者流离琐尾，仍须安集”^②。1923年，丰宁县大阁镇被抢，焚烧房屋118间，击毙商民20名。1924年，土匪许喀叭在开鲁县城大肆抢劫，商民遭殃。由于热河的兵匪问题特别突出，所以对热河的生产力的破坏作用也尤其严重。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溃败的奉军，经宽城、平泉、凌源等地，退回东北。在宽城，奉系溃兵连续“十天将宽城街商铺现款和所有当号物件，搜抢一空，损失尤巨，仅永吉当损失约计二万八千元”^③。宽城街受灾商铺多达52家，共损失308000余元。同年3月，热河游击军霸占商界房屋，勒索民财，其行为比土匪更甚。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热河“介处其间，或视为南下之捷途，或视为北上之要道，炮火所经，村落索然，魂飞魄落。兼之征调夫役，勒派车马，责成供应，村落萧然，鸡犬无存，十五县之间，甚至数十里无人烟。多少村无

^① 秦奎一主编：《近现代朝阳人民革命斗争大事纪 1836-1949》，沈阳：白山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22页。

^②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③ 政协平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泉文史资料 第三辑》，1987年6月，第41页。

釜甄，而车马有自八月外出，至今无踪者……尤有进者，热河之兴业银行，本属省立，股商且居其半，是诚全热商民之命脉。而当兵马仓惶，被各统兵马将帅，相继携去钞票至五百余万之多”^①。1925年，奉系溃兵在兴洲、小城子一带进行抢劫，众多民房被毁。热河土匪的抢劫、烧杀等行径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巨大损失，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

第三，热河土匪的活动造成了农村大量劳动力的丧失。

土匪的活动造成了农村人口的丧失。一方面，一些无辜百姓在土匪抢劫活动惨遭杀害，农村失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如，1916年，巴布扎布匪帮在林西杀害无辜百姓300多人。1922年，巴匪余党又在开鲁杀害百姓300余人。杀害百姓最突出的当属抗战胜利后重新猖獗起来的土匪。从1945年9月到1945年12月，仅热东热中两分区就受匪袭击，损失1785人。另一方面，受到匪徒的侵扰，很多百姓被迫当了土匪或者流亡也使热河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损失。1913年，“曾据赤峰、阜新、建平等州县知事详报，汉民及各旗蒙民在开鲁种地为生，凡数千人，受匪涂炭，均将家产抛弃，逃避山谷者，鸠形鹄面，残命苟延”^②。“热河的民众，因受环境的压迫，迫于生存问题的关系，铤而走险变为匪徒者难以数计”^③。

2.2 民国热河政府的治匪策略与措施

2.2.1 出台法律规章镇匪

为了防御、震慑土匪以减轻匪患，民国政府首先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规章。民国初期，为了强化社会治安，袁世凯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例，来维护其独裁统治。1913年，北京政府出台了《清乡取缔规则》，明确规定：清乡以揖治盗匪，保卫地方为宗旨，其中对编乡勇组成乡团来防御盗匪也作了明示。1914年3月2日，袁世凯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和《警械使用条例》，3月3日公布了《豫戒条例》，4月9日公布了《警察奖章条例》，5月20日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11月公布了《易箝条例》、《惩治盗匪法》。

《惩治盗匪法》规定：意图扰乱公安而制造收藏枪支或携带爆裂物品者；聚众掠夺公署的兵器子弹及船舰钱粮者；掳人勒索者等为匪徒。之后北京政府又颁布了《惩治盗匪法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318页。

^②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③ 《大公报》1931年5月30日。

施行法》。《惩治盗匪法施行法》规定：“遇有成股盗匪猝发，或盗匪持械拒捕，除由防剿之军警各队临阵格杀者外，其当场拿获盗匪各犯，由防剿之军警各队首领长官，立即审判执行”^①。南京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惩治绑匪条例》等法规。

民国热河第一届都统熊希龄上任不久就颁布了《警戒热河军人通告》、《对于热河政党之通告》、《维持热河治安通告》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限制官兵的同时加强对土匪活动的打击。其中《警戒热河官吏通告》中规定：“凡我地方各知事，有能严厉治盗者受上资，推诿自安者膺重咎，毋博煦子仁美之名，致貽姑息养奸之患。以除暴安良为责任，以有案必破为考成，涤瑕去秽，务尽根株，除莠清乡，誓无余孽”^②。并警戒官吏：“纵贼即为误国”，“为法律所不容”。在《警戒热河军人通告》中说：“保卫疆土，剿捕贼，爱护人民”，方可“使地方永保治安”，方可“尽军人之责任”^③。

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民国政府剿灭土匪武装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当时对土匪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匪患。但由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军队官员和地方官员常为了自身利益，对土匪姑息纵容，甚至窝藏、包庇、勾结土匪，法律条文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政策法规的颁布并没有改变土匪横行的局面。

2.2.2 增强组织力量抗匪

2.2.2.1 实行奖惩措施

热河主要靠军队、警察和保甲力量维持地方治安。军队分为驻军和地方武装。驻军主要是清末组成的毅军，地方武装主要有热河游击马队。热河地方政府实行奖罚的方法激励军警剿匪，加强剿匪力量。1923年6月23日，王怀庆都统由于“以阜新及赤围一带大股土匪现虽剿灭殆尽，仍恐怕有零星小股乘机思逞……兹由本署拟定《军警缉捕临时赏罚办法》，除分行外，合亟随文抄发，令仰该知事遵照转饬所属，切实奉行，务期有匪必获尽绝根株以靖地方”^④（标点笔者附加）。《热河军警缉捕临时赏罚办法》规定：“一、各县知事应饬所属团警，随时严密访查境内匪徒，认真缉捕。如遇股匪，力有未逮，应即飞会就近陆防各军派队携剿；二、不论官兵警团缉获盗匪，按名准给赏洋十元，

^① 《东方杂志》第12卷1号，法令，1915年1月1日出版，第6页。

^②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398页。

^③ 承德市档案馆：120-1-191。

^④ 承德市档案馆：120-1-191。

如系著名大盗从优，另议奖赏……”^①（标点笔者附加）。1926年，热河全区警务处又制定了《警察缉匪奖罚规则》。《规则》共计15条，细化了赏罚的内容，如规定“各警区发生盗案，如有杀伤事主放火绑票重情，勒限一个月缉获，限满未获一名者，该管巡官记过一次；展限一个月仍未获者，巡官记过二次，该管区记过一次；再展限一个月仍未获者，巡官记大过一次，巡官记过二次，警察所长记过一次；满丰年而未获者，巡官记过二次，区官记过四次，所长记过二次，如一个月限满之后能拿获匪首一名或伙匪二名以上者，除警士酌给奖洋外，观长各免记过，其情节较轻之案，统限两个月缉获，限满不获该管巡官记过一次……凡盗案发生当场全数拿获及格毙，或于三日内全获者，在事出力官警，除酌给奖洋外，各记大功一次，虽未全数拿获而当场拿获首要暨获犯，及半数或格毙首要者，各记功一次，其余限内拿获首要二名以上，或获犯遇早者亦各记功一次……各警官于承缉案外，能拿获临境盗匪一名，记功一次；如系著名匪首或拿获二名以上者，记大功一次；至格毙临省盗匪者，按毙匪多寡分别记功次数”^②。奖罚还和薪俸、升降联系了起来。《规则》规定“警官警士记大过一次者各减月薪十分之一；警士记过至二次或大过一次以上者，即行斥革警官；记过七次以上或大过三次以上者，即行撤差以示惩罚；警官警士记功三次者，准作为记大功一次；记大功三次者，即行提升以资鼓励”^③（标点笔者附加）。《警察缉匪奖罚规则》较《军警缉捕临时赏罚办法》更加完备，关于赏罚办法也更加详细，刺激了热河各县警察剿匪的斗志。

2.2.2.2 创办地方保卫团

地方自办保卫团也是热河政府增加剿匪力量的方法之一。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军队、团练不能阻止匪患蔓延，“政府为提倡人民之自卫计，乃令地方自办保卫，以防‘匪患’。土豪劣绅利用此种组织，招收壮丁，迫令地方供应款项，购军火，发给养。权力在握，遂形成乡村间之土军阀，武断乡曲，敲剥良善。其供使用之团丁，工资既高于农工者，又可于其主脑所掠夺之余窃取残#，故农工皆愿插身于保卫团中，因而田间少有人工作”^④。据统计，民国年间，保卫团人数不少于全国士兵人数。1924年8月24日，热河全区保卫团总局发布第九十九号训令，重申“保甲民团商团警察保卫团”以“保

^① 承德市档案馆：120-1-191。

^②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1。

^③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1。

^④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0月第1版，第901页。

卫地方捍御盗匪为本职”，之后颁布了《热河地方保卫团条例实施细则》。《细则》规定：在“县属未设警察地方因人民之请求及县知事认为需要时得报明本省长官设立保卫团”，“保卫团依本团户数编列十户为一牌，置牌长一人；十牌为一甲，置甲长一人；五甲为一保，置保董一人……第十三条 团内住户有藏留盗匪或寄顿赃物时，团总等得随时确查，指获送由总监督惩办；第十四条 各团有匪警时，团总得临时召集团丁围捕除匪徒。拒捕应有正当防御外，于捕获后送由总监督#办，不得违法私（#证）”，（标点由笔者附加）。《细则》还制定了奖罚规则：“各团办理保卫事宜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由总监督核给奖励。一 查获著名或悬赏缉拿之巨匪证明惩办者；二 盗贼抢劫登时捕获者；三 团内无盗贼土匪踪迹者；四 协同他团捕获盗匪者；五 因捕获盗匪被伤或毙命者。各团办理保卫事宜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由总监督量予惩罚。一 容匿盗匪者；二 团内发生抢劫重案未能登时捕获者；三 探访未确误行逮捕或有意诬及良善者；四 偷惰不能得力者”^①（标点由笔者附加）。

2.2.2.3 加强武器监管

民国时期，土匪的枪炮“私制私购者十之一，而得之于军队兵士者十之九也”^②。“吾国之兵，则其所招募者，皆素来无恒业之游民也，恃入伍以博升斗之食，一旦给资遣散，其习于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也已久，不啻放百万虎狼于民间矣”^③。由于认识到“各处匪徒之肆扰无不挟持利械，故能与官军时相抵抗而剿捕多费时日，惟枪械之用恃有子弹”，而“匪徒所持之子弹虽有时购自外人，而就地以重价收买者亦所在多有”^④。所以，1914年8月，热河都统署颁布《稽核民间枪弹章程卷》，来加强武器监管，断绝土匪的武器来源，《稽核民间枪弹章程卷》规定：“各将军、各护军使、各巡按使、各都统应订立稽核弹药章程……各军队、团防局等处研存子弹数目应详查明确，为嗣后检查之根据。装造子弹之局厂，应将从前存储确数及以后增装数目并以后发给各处数目随时列表查由，高级长官随时派员抽查存发数目是否相符；各机关存储子弹应列详表由管理员不时点查，以防锈坏盗卖等弊；军队连长、排长等应不时检查兵士弹药盒或子弹带等有无破坏，发给子弹是否足数；军队剿匪消耗子弹应由各该长官查，酌情形订立临时检查之法，

^① 承德市档案馆：120-1-240。

^② 《申报》1914年6月11日。

^③ 《申报》1923年5月7日。

^④ 承德市档案馆：120-1-11。

转报高级长官备案，并由高级长官随时派员查核曾否同法实行；军队出防携带子弹由高级长官规定数目，每连分配若干，由连长负其保管责任，如发给兵士时应督同排长不时检查；严定盗卖子弹之罚则，并随时派探秘查其人民，见有盗卖及收买子弹之犯，能立时举发者，俟审讯得实，分别给赏；稽察不力之官长应加以严重之处分，务使匪徒子弹不能就地接济，更于交通便利之处严密查察，使暗中售卖及囤买者均无所托足，庶匪无所恃，而蠢动可免乱，既生而歼除较易”^①（标点笔者附加）。热河都统署同时还颁布了《热河稽核弹药章程》和《热河稽核民间枪弹章程》，来加强武器的监管，严防武器落入土匪手中。

2.2.2.4 越境剿匪和联防

在热河地区，由于“各军队越境剿匪多有不预先通知以致兵匪不分，发生误会并有假借剿匪为名越境勒索商民骚扰地方者”^②，所以，为了有效的打击土匪，热河都统署在1925年11月13日，颁布关于军队越境剿匪的训令和《军队越境剿匪办法》。规定“越境剿匪之军队及剿匪区内之军队并该地方军警主管机关皆宜遵守之……各军队奉令越境剿匪时，无论临境地方官及警甲已否受同样命令，应于未出发前先用电报或电话通知，到达时更须妥为接洽……带队官职名、队号、人马数目，等均应通知，避免误会而便代筹供给……如因追剿股匪必须越境时，除按前条办理外，更应将匪情详为通报，避警甲得以预防并协助……剿匪区如不能通电时，应先派专人前往接洽，其办法同前……该临境如有驻军时，尤应确取联络……军队人马之给养除携行者外，应由地方机关代为筹备，该军队公平给价，不得勒索强派……各军队沿途之尖宿必须居住民房时，应由地方机关代为选定，不得擅住民房，暨私入民宅以重纪律……剿匪区内之驻军警甲对于越境剿匪军队如有要求协助时，均有应付之责”^③（标点笔者附加）。

热河地区还实行联防，来防止匪患。1926年7月31日，热河全区清乡总局发布训令（第三号），“为令行事查热河幅员辽阔，现值青纱帐起，驻军移防，匪警在所难免，各县警甲力单，此拿彼窜，防堵殊难，势非办理联防，协同剿缉，不足以弭患，应由各该县知事择适中地点定期会议办理联防”，并规定办理联防县分：“承德平泉隆化；隆化丰宁滦平；围场赤峰隆化；平泉凌源赤峰；建平朝阳阜新；绥东开鲁鲁北；林西经棚林

^① 承德市档案馆：120-1-11。

^② 承德市档案馆：120-1-246。

^③ 承德市档案馆：120-1-246。

东”^①（标点笔者附加）。1927年1月，热河保安司令部发出训令，基于匪患与地方治安的有紧密关系，“非实行联防不足以收实效而策万全”、“绥靖地方保卫善良，非实行联防合力剿匪不足以清盗源”的认识，作出“速即计划各县联防妥善办法，转饬警务处各县知事、各县警甲以后对剿匪完全负责，而各村正副应将村中匪徒随时报告警甲，以资捕获。各该县务须合力痛剿，不准互相推诿，并限至十八年三月底止各县务将辖境匪患一律肃清”^②（标点笔者附加）。训令具体规定：“本县有警，除督饬该管警练及驻防军队立予剿捕外，一面并赶紧通知邻县军队及地方警练协力痛剿，或预先扼据要隘截堵邀击，总以匪无逃匿地方，不得再行回窜或漏网为止。各邻县驻军、警练接到通知后，亦立予照办，不得借口事属他县稍有推诿”^③（标点笔者附加）。

2.2.3 剿抚并用治匪

由于土匪具有天然的反政府和反社会性质，轻则危害一方百姓，重则危及政府的统治，因此只要力量允许，历代官方都会对土匪采取剿杀的策略。

1922年，“蒙匪”巴布扎布余党侵犯热河并占领开鲁，热河都统汲金纯派张连同率热河游击马队前往围剿，收复了开鲁城。王怀庆掌管热河期间，土匪二生子股伙在热辽边沿一带往来窜扰，人民受害很深。于是，王怀庆在北京给米振标电示：“股匪二生子，久在阜新边沿一带盘踞，近复屡屡窜入边境，在黑山等县滋扰，并绑去段家窝棚人票，若不速为剿灭，实为边境之患，刻已饬赵旅长、李师长分饬军队，前往黑山县，会同当地警甲，严刑剿办，以靖地方。应请迅饬热河阜新驻在军警，协力兜剿”^④。

热河当局对待土匪，除了武力清剿外，更多的是收编土匪，招匪成军，以匪治匪。这既是官匪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历届政府对待土匪的惯用伎俩。地方官属认为，收编土匪一方面可以避免兴师动众，省去惊动军警；另一方面，收编的土匪亦可以作为地方武装，去消灭其他未降的匪帮。同时，地方驻军长官、各派军阀也常依靠收编土匪来扩充自己的势力。民国初年姜桂题热河任都统时，收降土匪十分积极。例如“热河游击马队毅军左右翼马队官长中（十）之三四，兵士中十之八九，皆属降匪，其余如热河陆巡

^①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2。

^②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2。

^③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2。

^④ 承德市档案馆：热河都统署训令第一一零一号。

各军遇有空额亦多招募胡匪”^①。地方军队、各路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也多招募土匪。热河地区地方军队主要分为毅军和热河游击马队。除了地方部队，还有各派军阀。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多收编土匪和民团。如热河游击马队就是以毅军为基干，收编土匪成立的。其第四营里的连长除了马仲云，其余都是收编的胡匪头子。淮军帮统乔健才，利用当地的土匪组织了一个骑兵团。直隶练军外八营统领殷贵，为了恢复八营编制，把朝阳的民团编了四个营，并将朝阳的胡匪编了一个先锋营。

热河各届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治匪政策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对治理热河土匪、减轻匪患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这些政策和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和消除土匪产生的社会土壤，所以不可能根本消灭土匪现象。

^① 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333页。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热河匪患的治理及肃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解决匪患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抓，热河地区的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对解决匪患做了不断的尝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正确的策略对土匪进行了清剿，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彻底消除了匪患，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扫清了障碍。

3.1 中国共产党对土匪政策的转变历程

土匪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如何改造利用土匪武装，壮大革命队伍，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艰难任务。中共对土匪所采取的政策是随着对土匪武装的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全国工农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和开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各地纷纷成立。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很多人发表言论，认为土匪游民是可以改造加以利用的。在这样的认识指挥下，热河共产党人韩麟符在《热河志工作计划》中制定出了利用土匪的政策。《计划》规定将热河境内所有的农民武装、警察、军队及土匪近三万人，供给军火，可以归于我方。然而这一时期正是热河土匪活动最猖獗的阶段，加上党内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土匪是阻碍革命行动的，而他的右倾思想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中共做出了禁止土匪加入农民协会的决定。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思想一再左右着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中国中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异常危害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①。同年9月末，中共顺直省委依据中央精神，在《关于内蒙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过去我们内蒙古（三特区）的工作，有两个普遍的错误，即勾结土匪，组织军队的军事投机和没有党的观念等”

^① 《中国共产党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79页。

^①，拒绝改造土匪，并和土匪划清了界限。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控制下，制定出了“绝对反对同土匪头子、红枪会领袖等进行上层的联合，坚决反对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土匪路线”^②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后，热河地区的土匪纷纷加入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据统计，当时东北土匪“约占整个东北抗日义勇军20%左右”^③，另有记载“绿林队伍约占15%”^④。“这期间，内蒙特委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羁绊，但已经开始注意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问题”^⑤。为了做好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特委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热河的建平、朝阳、赤峰和开鲁抗日前线地区，但由于“左”倾关门思想的制约，内蒙特委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少。

1935年，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和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中共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等文件，国难当头向“各山堂的哥老会大爷、四路好汉兄弟”伸出了友好结盟之手。抗战初期，热河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艰苦，土匪武装开始分化。他们有的加入到了八路军的行列，参加抗日；有的本性难移，依然从事烧杀抢掠的土匪活动；有的做了日伪侵略中国的帮凶。中共对于继续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土匪采取了肃清的政策。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国内战，集中兵力向华北、东北和华中的解放区发动进攻。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下，热河地区的土匪再次猖獗起来。由于这一时期的土匪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因此，清剿土匪、肃清匪患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当务之急。经长达6年的剿匪斗争，彻底肃清了热河地区的匪患，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

^①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18页。

^② 转引自王全营：《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工作的策略》，《商丘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③ 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237页。

^④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25页。

^⑤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61页。

3.2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剿匪

3.2.1 抗战胜利后热河土匪的罪恶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热河匪患重新猖獗了起来。这时期的土匪是汉奸伪军警、国民党特务、武装地主和惯匪组成的四位一体的反动武装大联合。他们以国民党为靠山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杀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试图摧毁民主建设事业。这一时期的土匪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前后,全省有土匪100多股,约1.5万人,主要活动在热辽、热东、热中和热北地区。他们配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杀害干部,蹂躏人民,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新生的民主政权。

3.2.1.1 配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

当国民党向热河进攻时,土匪采用组织匪徒直接配合作战、扰乱后方等方式配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如蒙奸沁布多尔济的匪队配合蒋军抢占了北票,蒙奸李守信、惯匪刘清林、张子怀抢占朝阳,王发匪队抢占凌源,于大川抢占建昌等等。

3.2.1.2 摧毁新建立的民主政权

由于土匪中的地主、伪满人员和地方恶霸极端仇恨地方干部,因此袭击地方武装、杀害区村干部,摧毁民主政权是他们的主要行径。从1945年冬到1948年年底,不断出现土匪袭击地方武装,杀害地方干部的事件。“据隆化、滦平、丰宁、围场、平泉、宁城、建昌、朝阳、凌源、建西、承德、青龙、林西、经棚、北票、建平等16个县不完全统计,有81个区公所被土匪袭击”^①。“被土匪杀害的区(营)级以上干部133名,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30名”^②。人、物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3.2.1.3 破坏土地改革

这一时期,共产党在热河进行了土地改革。“由于发动了群众与敌人的进攻,地主阶级乘机反攻,组织土匪,土匪除了袭击我区政权,杀害干部,配合敌人侵占我城镇外,已开始摧毁我农会组织,镇压翻身农民”。他们强行“收回土地,并威逼群众多交出粮食,或罚钱,……还威逼民兵从匪,承德撤退后,整个热西地主乘机反攻,收回土地,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第11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第11页。

吊打群众，杀害农会党员及干部，威逼民兵从匪”^①。

1947年12月，热西土改工作团在滦平、隆化、丰宁三角地带进行土改。隆化的赵珍、于合、张显耀、卢文、李凤、曹喜珍、王怀民等，围场的刘金生、牛刚、袁喜廷等，滦平的田永芳，丰宁的王德才等匪帮纠集在一起，组成2千多人的匪军，轮番袭击土改工作团、砸抢农会。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3月，杀害工作团干部30余人。他们还接连制造了“大营子惨案”^②、“北沟惨案”^③等。

除了以上所述，热河地区的土匪还截击过军事运输线，抢劫军用物资，策反地方武装，残害百姓。

3.2.2 共产党的剿匪政策

1945年11月26日，在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发出的《关于热河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把“肃清土匪”作为“目前热河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来抓。1946年10月3日，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做出《关于限期肃清热河匪患的决定》。具体内容如下：“（一）抽调得力干部成立工作委员会及抽调部队成立剿匪司令部。（二）工作委员会及剿匪司令部的任务是限期彻底肃清匪患，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改革和壮大地方武装及民兵。（三）关于肃清土匪的政策是：分化瓦解、剿抚兼施、先打后拉、严惩匪首、争取匪众，对悔过自新采取宽大政策，不究既往，缴枪不杀。对土匪家属不得杀害。动员匪属争取土匪回家。（四）剿匪部队及工作人员必须纪律严明。不得丝毫侵犯群众利益，必须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五）剿匪战术，深入匪巢，连续围剿，奔袭合击，追击，不让土匪稍有喘息，彻底肃清，不分地界，一股一股的肃清，以达到全境完全肃清为止。（六）各地必须同时动员，配台行动。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组织，加强通信联络，建立联村防匪及清查户口除奸保卫等工作，不让土匪有此剿彼窜之空隙”^④。热河省政府还颁布了《处理投诚土匪暂行办法》，规定“凡土匪悔过自新后，放下武器改邪归正者，一

^① 河北省档案馆：521-1-86-7。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第12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第13页。

^④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热河解放区（上、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191-192页。

律予以宽大，不究既往”^①。

3.2.2.1 共产党的剿匪策略

为了彻底肃清匪患，巩固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清剿土匪政策的指导下，实施了以下灵活的剿匪策略。

1. 发动群众与剿匪斗争。发动群众是彻底肃清匪患的基本方法，经验证明，只有真正的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摧毁土匪的社会基础，彻底肃清匪患。在热河解放区，发动群众的最基本方法是发动群众参加反霸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来推翻汉奸、恶霸、地主的反动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1945年，热河省委颁布了《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开展了清算复仇斗争。1946年，中共中央实行了减租减息，部分解决了土地问题。1947年，《土地法大纲》公布后，热河省出现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广大群众剿匪的局面。发动群众的方法还有发动群众摧毁“匪窝子”、“匪溜子”（行动路线），开展群众性的搜山查户活动，组织人民武装联防，发动群众组织情报网等。

这些方法在整个剿匪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统计热河全省从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民兵作战834次，毙匪294名，伤匪378名，俘匪大小头目326名，瓦解518名，缴获重机1挺，轻机枪4挺，步枪430支，短枪23支，子弹75452发，战马102匹，大车10辆，粮食11.5万斤，盐7300斤，布104遇，大烟250两”^②。

2. 剿匪斗争与政治工作相结合。政治工作是肃清匪患的必要保证，热河的剿匪工作很重视政治工作。在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热河省委和军区的历次剿匪指示和命令中都对剿匪斗争中的政治工作做了具体布署。1947年6月10日，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专门颁布了《关于剿匪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1948年7月7日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剿匪中的政治工作主要针对部队、群众和土匪三方面。对部队，通过深入动员及经常性的思想工作，坚定部队清剿土匪的决心；通过开展立功运动，激励士气；通过加强群众纪律教育和政策教育，密切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促进剿匪任务的顺利完成。对群众，通过对其宣传剿匪意义、人民军队的剿匪纪律，使群众积极配合部队剿匪。对土匪，通过发布告、发传单、群众大会、匪属亲朋会等方式，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以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① 河北省档案馆：195-1-13-12。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第29页。

1949年7月27日,热河军区发布的《剿匪命令》中指示:“在缴匪工作中,要认真执行对土匪的政策,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使军事进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对于坚决与人民为敌,敢于进行顽抗的首恶份子,要坚决无情予以消灭。对于放下武器,自愿改邪归正的协同份子,则予以宽大处理,允许他立功赎罪。对于战斗中或搜查中捕获的土匪,一律交给上级,根据其罪恶大小,悔悟程度,给予分别处理。对于土匪家属,要进行争取教育,不得乱抓乱打;并动员他们,规劝其子弟改邪归正,回家生产,当好老百姓”^①。

3. 及时总结剿匪经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减少剿匪损失、顺利进行剿匪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1947年6月13日,热中十九军分区作出《目前剿匪指示》,指出:“应以每次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来教育部队各级干部,亦应根据实际情形不断地进行检讨与研究经验教训”^②。热河军区剿匪斗争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为剿匪的最终胜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注意剿匪战术。具体的军事剿匪对肃清匪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军事战术又与军事剿匪的效果密切相关。热河地区在具体的剿匪作战中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剿匪布署;各地区各县都要选择重点匪区、股匪,集中优势兵力,严密部署,务求全歼;实行驻剿、追剿、堵剿密切配合的剿匪战略。要求剿匪部队在剿匪军事行动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扑空的精神,采用奇袭、奔袭、猛打穷追、合击包围等战术清剿土匪。

3.2.3 剿匪过程

热河清剿土匪从1945年9月至1951年9月,经过6年时间的斗争,肃清了热河土匪。热河的剿匪斗争大体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9月到1946年春,主要是清剿日伪汉奸、伪军、惯匪等组成的大股土匪。抗战胜利初期,为了巩固解放区,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派出了热河纵队二旅、三旅,热辽纵队二十七旅、三十旅和黄寿发纵队一个旅的主力部队和各分区独立团、骑兵团、县支队共四五万人,在热西、热东、热辽、热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这一时期,在热西地区,热河二旅在北平部队的配合下,先歼灭了韩继功匪队,后

^① 河北省档案馆: 187—1—2—1。

^② 河北省档案馆: 194—1—10—4。

又对张福元、李德林匪队进行了围歼和改编；热辽纵队三十旅、热西骑兵团和热北分区部队，联合围剿了流窜在林西、经棚、围场等地的张桐轩、伊相臣、郭九江等匪队，大部分土匪被歼。据统计，热西地区从 1945 年 11 月至 1946 年 4 月，共消灭土匪 5100 余人，收缴枪支 6000 余支，使热西地区一度出现了安定的局面^①。在热中地区，热河三旅先击垮了惯匪王近喜匪队，后在宁城击毙惯匪杜耀亭匪队 80 余人。在热辽地区，热辽军队主要进行了围歼沁布多尔济、于海川、“绿五点”、“张地龙”匪队和盘山、北镇、台安、黑山四县的土匪的斗争。热东地区围歼了于大川和刘清林匪部。经过这一阶段的剿匪斗争，热西、热北地区的股匪大部分被消灭了，热辽、热东、热中、热北地区的土匪也被大大削弱了。

第二阶段是从 1946 年冬到 1947 年春，主要打击了配合国民党侵犯热河解放区的股匪。1946 年秋，热河再次被敌军占领，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热河解放区，一时土匪蜂起。“仅在热北、热西就有 100 多股，匪众 7600 余人。热东地区仅朝阳、建昌两县就有匪 114 股，6500 多人。热辽地区 3200 多人，热中 3300 多人，全省境内武装土匪可达 2 万人以上”^②。这一阶段的土匪，政治色彩非常突出。根据这一阶段土匪的特点，热河解放区军民对土匪进行了清剿。

热北、热西是剿匪的重点地区。在这一区域，剿匪司令部的统一布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联合清剿。第一次在 1946 年秋，基本清剿了“压五洋”和“老二嫂”股匪，白金辉股匪也遭到重创。第二次是 1947 年春，在热北沙漠地带追击韩桑杰股匪，并在克什克腾旗再次围歼白金辉股匪。经过这两次清剿，沉重的打击了热北、热西的土匪。热东、热辽、热中、热南地区的股匪也都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一阶段的剿匪斗争，剿灭土匪 5395 人^③，基本肃清了中心区的匪患，扩大了热河解放区，取得了清剿土匪的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是从 1947 年夏至 1948 年春，主要剿灭进行反扑的地主武装，叛匪降队，还乡团等匪队。这一阶段，冀察热辽区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在进行反攻的战斗中也消灭了一大批土匪，其中包括白金辉、赵珍、郭九江、于文斗、姜小胡、张其昌等股匪。

^①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42 页。

^②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76 页。

^③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8 页。

经过这一阶段的剿匪斗争，热河的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干净了。

第四阶段从1948年至1951年9月，主要是彻底清剿残匪。1948年冬，热河全境解放，但是仍然有部分匪徒结成小股，流窜作乱。1948年12月，中共热河省委、省政府做了清剿土匪的部署。根据指示，各县、旗迅速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清剿土匪的行动。1951年9月，热河境内的土匪被剿灭干净，热河的剿匪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实践证明，抗战胜利后，热河的剿匪政策和策略是正确的，最终彻底铲除了热河匪患。热河的剿匪斗争是热河人民在热河党组织的带领下进行的艰苦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结 语

热河的建制虽然已于 1956 年正式取消了，热河地区的匪患或许也远不及东北三省、山东、河南甚至湖湘地区严重，但是热河的土匪同样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热河的土匪活动贯穿于整个热河近现代社会，它的兴亡与热河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民国时期的热河土匪虽然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产物，但因其靠近京畿，对中国社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且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在热河土匪的政治色彩比其他地区的土匪表现的更为明显，所以对其不能单纯用军事剿灭的手段，而应当着重于政治手段，这也是我们能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原因。

土匪虽然大多数出自贫苦农民，是一群边缘化的人民，也是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从事的活动有时甚至被一般百姓所同情，但是其主流是被社会所反对的，其活动最终也必须被消灭。土匪问题靠单纯的立法规范、军事剿杀，就像民国热河历届政府所做的那样，是不能彻底解决的，而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土匪滋生的土壤，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现阶段，虽然土匪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亡，但是当今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绑架勒索、抢劫、走私贩毒等犯罪现象，仍然存在着车匪路霸、黑社会集团、恐怖分子等危险群体，这些都直接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怎样有效的防暴止暴，减少犯罪现象的发生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土匪产生的原因及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对于防暴止暴，遏制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现象的发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一） 档案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

- [01] 河北省档案馆：通报-喀东匪特猖獗地主反动花样翻新，1949年8月，186-1-62-6。
- [02] 河北省档案馆：在中共热河省党代表会关于生产建党锄奸剿匪报告摘要，186-1-73-5。
- [03]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情况，186-1-78-4。
- [04] 河北省档案馆：热和省关于目前剿匪工作的指示，186-1-80-2。
- [05]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省自然社会的特点，186-1-82-3。
- [06]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军区剿匪命令，1949年7月27日，187-1-2-1。
- [07]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军区：匪情通报，1949年6月4日，187-1-2-8。
- [08]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军区：匪情通报，1949年7月28日，187-1-2-9。
- [09]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军区：情报，1946年10月16日，187-1-4-3。
- [10] 河北省档案馆：十八地委：关于限期清剿境内土匪的通知，发至县级，188-1-44-4。
- [11] 河北省档案馆：十八地委：地委联合剿匪以巩固根据地的通知，188-1-44-5。
- [12] 河北省档案馆：十八军分区政治部：练兵与剿匪的政治工作，189-1-1-2。
- [13] 河北省档案馆：热西地委：关于肃清土匪的紧急指示，1948年10月7日，191-1-6-4。
- [14] 河北省档案馆：热西军区情况通报，1947年10月31日，192-1-3-4。
- [15] 河北省档案馆：热中地委：关于剿匪问题的决定，193-1-36-14。
- [16] 河北省档案馆：地委关于青纱帐前彻底肃清土匪的指示，193-1-36-18。
- [17] 河北省档案馆：热中地委：热中分区土匪概况，1947年3月17日，193-1-56-6。
- [18] 河北省档案馆：热西十九军分区：目前剿匪指示，1947年6月13日，194-1-10-4。
- [19] 河北省档案馆：热中专署：热河省政府颁布处理投诚土匪的暂行办法 195-1-13-12。
- [20]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省政府：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附调查要点及剿匪办法），1948年9月22日，521-1-85-7。
- [21] 河北省档案馆：热河省政府：热河土匪统计表，521-1-86-9。

承德市档案馆馆藏：

- [01] 承德市档案馆：120-1-11。

[02] 承德市档案馆：120-1-191。

[03] 承德市档案馆：120-1-240。

[04] 承德市档案馆：120-1-246。

[05]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1。

[06] 承德市档案馆：120-1-302。

（二） 文史、报刊资料

[01] 政协平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平泉文史资料 第三辑》1987年6月。

[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围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围场文史资料 第3辑》，1989年7月。

[0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阜新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阜新文史资料 第5辑》，1984年6月。

[0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赤峰市郊区文史资料》，1991年1月。

[0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6-7辑》，1990年5月。

[0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 第2辑》，1986年8月。

[0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赤峰郊区 第二辑》，1991年1月第1版。

[08]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1996年7月第1版。

《申报》（1921-1931年），《大公报》（1921-1933）

（三） 专著、综合类资料

[01] 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02] 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

[03]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04]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大事记 1919-1955》，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05] [英] 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 [06]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土匪实录 中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
- [07] 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上、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年 1 月第 1 版。
- [08] 冉光海：《中国土匪》，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
- [09] 李锐：《热河烟云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 9 月第 1 版。
- [10]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热河解放区（上、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 7 月第 1 版。
- [11] 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 [12] 黄建远、孙先伟、刘培昌：《土匪的历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 2 月第 1 版。
- [13]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 [14] 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第 1 版。
- [15] 王元年：《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 [16] 冯力：《剿匪大纪实（上下册）》，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4 月第 1 版。
- [17]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年 7 月第 1 版。
- [18] 李金明：《燕赵扫残——华北大剿匪》，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年 2 月第 1 版。
- [19] 曹保明：《东北土匪》，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 [20] [英]霍布斯鲍姆[Hobsbawn,E.]：《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 年 1 月第 1 版。
- [21]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 [22]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 [23] 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一～四辑》，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 4 月第 1 版。
- [24] 佟宝山：《阜新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年 4 月第 1 版。
- [25] 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 4 月第 1 版。
- [26] 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年 5 月第 1 版。
- [27] 林曾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 [28] 彭先国：《民国湖南土匪史探》，长沙：岳麓书社，2002 年 5 月第 1 版。
- [29] 李品清、佟宝山主编：《阜新蒙古史研究》，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 年 8 月第 1 版。

[30] 金涛：《承德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四）学术论文

[01] 程子华等：冀察热辽剿匪概述，军事历史，1991年第6期。

[02] 程子华等：乐为人民安天下——冀察热辽剿匪斗争纪实，党史纵横，1991年第2期。

[03] 陈东、谢庐明：中央苏区土匪问题研究——兼论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及其对策，党史文苑，2008年14期。

[04] 赵文：试论抗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05] 高乐才：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土匪问题，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

[06] 张金宝：民国时期山东土匪问题论析，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07] 王宗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土匪问题研究，延安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08] 宋大鹏：近代山东土匪问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09] 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1912-1927），河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10] 汪远忠，池子华：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学术界，1998年第2期。

[11] 李妍：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世纪桥，1998年第3期。

[12] 赵俊清：略论东北解放战争剿匪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党史纵横，1988年第11期。

致 谢

时光飞逝，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心中感慨万千。

首先我要对我敬爱的导师刘敬忠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三年前，我非常荣幸的成为了您的一名弟子。三年来，您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终身难忘。三年来，您从没有因此放松对我们的教导。就拿这篇硕士论文来说吧，从选题到构思，再到撰写，一步一步，无一不是在您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我像是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在您的关爱下迈出了成长的步伐，渐渐的成长了起来。去年寒假前，我的论文初稿出来，我兴奋的捧到了您面前，像捧着在您照顾下结出的劳动果实。当您把批注的密密麻麻的初稿给我时，我哽咽了。那是在漫长的寒冬，我们都在家休息的时候，您却不停工作的结果。我会一直珍藏那本初稿的。您一直教导我们：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令我敬仰。

我要感谢范铁权、肖红松、郑志庭、刘宝辰、彭小舟、郭小勇、张殿清、郑清波等老师，感谢他们传授了我丰富的专业课知识。其中尤其感谢范老师、肖老师、彭老师和郭老师，你们对我的毕业论文的用心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我的同学们，和你们相识我感到很幸运。三年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了满满的快乐和真诚，我会用心珍藏这三年和你们度过的点点滴滴。

感谢我的亲人。在多年的求学道路上，父母默默无闻的支持和鼓励令我深深的感动。为了供养我读书，年过半百的他们还在家乡不停的劳作；为了使我没有心理负担，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感谢父母对我的深深的疼爱。感谢我的姐姐在我上学期间给予我的帮助。

学业即将结束，我想对养育我多年的父母说声谢谢！我每时每刻都满怀对你们的敬爱和感激。我想对教育我成长的老师们说声谢谢！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我想对陪伴我成长的同学朋友们说声谢谢！希望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